**清華簡《厚父》“周書”說\***

程浩

2014年第10期《文物》雜誌刊出了系列文章，對清華簡第五輯整理報告擬收錄的幾篇竹書進行了詳細介紹。其中的《厚父》篇具有“書”類文獻的特征，并有數句見引於《孟子》，內容與性質都十分重要。[[1]](#footnote-1)

《厚父》篇有簡13支，保存情況基本完好，惟篇首有些許殘斷，使之缺少了明確的紀年或時代方面的記載。簡文通篇為“王”與“厚父”的對話，但可惜的是並沒有交代參與對話的是哪一位“王”，而“厚父”其人亦是文獻闕如。因此，對《厚父》篇時代背景的判斷只能從其他方面入手。通過對現已公佈的部分簡文進行分析，我們認為《厚父》是一篇周初的“書”類文獻。以下就略陳淺見，謹供時賢參考。

首先，我們從《孟子》對《厚父》的引文說起。此句簡文原作：

古天降下民，设萬邦，作之君，作之師，惟曰其助上帝亂下民。[[2]](#footnote-2)

《孟子•梁惠王下》的問對中引用了這句話進行說理，并稱其為“《書》”。為方便討論，茲錄原文如下：

王曰：“大哉言矣！寡人有疾，寡人好勇。”對曰：“王請無好小勇。夫撫劍疾視曰：‘彼惡敢當我哉！’此匹夫之勇，敵一人者也。王請大之。《詩》云：‘王赫斯怒，爰整其旅，以遏徂莒，以篤周祜，以對于天下’，此文王之勇也。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《書》曰：‘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師，惟曰其助上帝，寵之四方。有罪無罪惟我在，天下曷敢有越厥志？’一人衡行於天下，武王恥之，此武王之勇也。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。”

孟子以文王、武王的事跡訓誡齊宣王“無好小勇”，并援引了《詩》、《書》以為證。於文王之功，引用了《詩•大雅•皇矣》的文句，並稱“此文王之勇也”；於武王之德，則稱引了《厚父》中的這句話，並且說明了“此武王之勇也”。我們知道，《皇矣》一篇主要敘述的是周代先王特別是文王的功業。《毛序》云：“《皇矣》，美周也。天監代殷莫若周，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。”朱熹《詩集傳》曰：“此詩叙太王、太伯、王季之德，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。”因此，《孟子》論武王之勇時，與之對舉的也應該是一篇以武王為主人公的《書》。宋人疏《孟子》既云：“此《周書》之文也。《孟子》所以又引此《書》云者，蓋又欲言武王之勇而陳于王也。”[[3]](#footnote-3)稱“《周書》”雖然有可能是受到偽古文的影響，但其對《孟子》引《書》用意的揣摩大致不謬。

再者，《厚父》篇的文辭也比較接近周初文獻。

比如簡文講咎繇“茲咸有神，能格于上”，“格于上”類似的用法兩見於《周書》的《君奭》篇，分別作“成湯既受命，時則有若伊尹，格于皇天”以及“在太戊，時則有若伊陟、臣扈，格于上帝”。簡文又說夏人“肆祀三后”，“肆祀”一詞《周書•牧誓》有之，作“昏棄厥肆祀”。

又如簡文說夏之慝王“沉湎于非彝”，《周書•酒誥》也有“縱淫泆于非彝”的說法。此外，簡文稱孔甲為“先哲王”，趙平安先生已經指出“先哲王”一詞見於《酒誥》、《康誥》以及《召誥》。[[4]](#footnote-4)

簡文除了有周初的《書》篇可以與之對應外，一些語句亦見於周代的頌詩。如簡文有“亦惟酒用康樂”，“康樂”一詞在清華簡《耆夜》的《蟋蟀》詩中就出現了三次，皆作“康樂而毋荒”。

《牧誓》為武王所作，《君奭》、《酒誥》、《康誥》、《蟋蟀》皆出自周公之手，《召誥》之作亦在周初。《厚父》的用詞與上述幾篇多有互見，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該篇的時代。

除此之外，《厚父》的部分用語還見於西周金文。如王說厚父的高祖“克憲皇天之政功”，《大克鼎》謂克的祖先師華父“肆克猒于皇天”，語意與之相類。大克鼎雖然晚至孝王，但其中的美飾之辭，大概也是承襲周初而來的。

最後，《厚父》中體現的治國理念也是周初文獻所反復強調的。

由於《厚父》篇的主旨為王向厚父請教前文人之明德，因此該篇充斥著當時流行的一些統治思想與治國理念。簡文開篇說“帝亦弗恐啟之經德少”，厚父在與王的對話中也是先追憶了夏之慝王“顛覆厥德”導致“亡厥邦”，而後王又讚美厚父的祖先能夠“虔秉厥德”。可見在當時存在著濃郁的“敬德”思想。我們知道，“敬德”是有周一代重要的治民方略，如《酒誥》講要“經德秉哲”，《召誥》勸誡“王其疾敬德”，《大克鼎》也說要“淑慎厥德”。

在總結王朝覆滅的歷史教訓時，《厚父》篇認為夏之慝王不若先哲王能“知天之畏”，因此“乃墜厥命”。在周初的傳世文獻以及金文中，周人屢次強調自己是敬天受命取代了殷商。如《詩•周頌•我將》載武王祭祀文王時說：“我將夙夜，畏天之威，于時保之。”清華簡《芮良夫毖》有“畏天之降災”，《周公之琴舞》又有“畏天之災”[[5]](#footnote-5)，可見“畏天”的說法在周代曾廣泛流行。

西周康王時期的青銅器大盂鼎，也能很好地反映上述這些思想觀念。在鼎銘中康王告誡盂要“享奔走，畏天畏”，并總結了殷代“墜命”的原因：

我聞殷墜命，惟殷邊侯甸與殷正百辟，率肆于酒。（《集成》2837）

認為殷代滅亡是因為飲酒無度，并要求“酒无敢酖”。這種戒酒的思想，在《厚父》篇中有大量論述，[[6]](#footnote-6)與周公作《酒誥》的主旨也是一致的。

通過以上論述，我們可以發現《厚父》篇無論是語言還是思想都與周初的文獻比較接近，而且從簡文記載的對話內容來看，其發生在周初的歷史背景下也是合情合理的。我們知道，武王克商後曾訪“前朝遺老”求治國之道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“惟十有三祀，王訪于箕子”。商遺民箕子傳授武王的“統治大法”——《洪範》今仍可見於《尚書•周書》，另外《逸周書》存有篇名的《箕子》與《耆德》兩篇，想必也與之相關。有鑒於此，我們或可以大膽猜想周武王克殷建國後也曾訪問了夏朝的遺民厚父，向其請教前文人之明德，遂作成了我們今天見到的這篇《厚父》。

附記：本文在寫作過程中承蒙馬楠先生指教，對本文多有啟益，特此致謝！

（程浩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博士研究生）

1. \*本課題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“清華簡《系年》與古史新探”（10&ZD091）、“中國國家起源研究的理論與方法”（12&ZD133）的資助。

   參見趙平安：《<厚父>的性質及其蘊含的夏代歷史文化》，《文物》2014年第12期。李學勤先生在前期介紹時也有提及，見李學勤：《清華簡再現<尚書>佚篇》，《中國教育報》2014年9月5日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本文引用《厚父》簡文皆取自趙平安先生文，釋文采寬式，下同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阮元校刻《十三經註疏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年影印本，第2675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趙平安：《<厚父>的性質及其蘊含的夏代歷史文化》，《文物》2014年第12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《周公之琴舞》“畏天之災”，整理者原讀“畏天之載”，此處讀法從胡敕瑞：《讀<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叁）>札記之四》，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，2013年1月7日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參見前揭趙平安先生文“夏代酒文化傳統”一節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